

梁启超与民国初期大学学风改革

——兼论官本位学风的解体

刘 婉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上海 200062)

[摘要] 中华民国成立前后, 梁启超面对大学生不以学问为求学目的的教育现象, 基于培养新民、加快大学现代化改革和振兴中国传统学术的需要, 提出了大学生当表率全国学风的观点。他指出, 大学生当从服从、朴素和静穆三个主要方面展示优良学风, 并努力将优良学风表率于全国。通过理论宣传和教学实践, 梁启超指出了大学生学风改革的实现途径: 一要指导大学生明确以学问为主的学习目的; 二是引导大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科学精神; 三是培养大学生匡正学风的责任意识。在梁启超等人的努力下,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既改革了传统的官本位学风, 也加快了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步伐。梁启超关于学风改革的思考对当今优良学风建设具有一定借鉴价值, 新时代大学生亦应坚守求知初心, 树立责任意识, 争当学风模范。

[关键词] 梁启超; 大学生; 学风; 学问; 责任意识

[中图分类号] G 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493 (2021) 03-0042-06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 在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 中国教育开始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 积极普及教育和推动教育现代化。这一阶段, 也是梁启超致力于教育文化事业时期。在民主政治理想破灭后, 因为游欧所见和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失败, 梁启超燃起建设中国新文化的美好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 梁启超致力于加快中国现代大学建设步伐, 培养“德智力”兼备的能够肩负振兴中国学术文化的新民。当发现旧的学风是高等教育现代化改革的障碍后, 梁启超将学风改革作为教学基本工作之一来做, 逐渐形成了他的学风建设理念。

以“民国学风”和“梁启超论学风”为主题分别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检索, 相关文献有十余条, 切合主旨的有8条; 其中, 有学者阐述了梁启超对于地理与“学风”关系的认识; 还有学者梳理了梁启超在文化启蒙中如何以“执中鉴西”的方式引领新学风建设。在各类教育史著作、人物传记和大学史料中, 论及民国学风时也多以蔡元培、杨贤江和钱穆等为主要考查对象, 较少关注梁启超的学风思想, 偶有提及, 也局限于总结梁启超个人博大、易变、融通的学风。现有研究均未全面深入挖掘梁启超关

于大学学风改革的历史, 为了还原这方面的情况并丰富有关梁启超思想的研究, 这里将主要围绕梁启超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的教学活动展开, 梳理民初梁启超关于学风改革的观念与行动。

一 大学生当“表率我全国之学风”的提出

1912年10月, 梁启超在北京大学欢迎会上陈述了自己对大学生学风问题的看法。鉴于大学是全国最高之学府, 大学学风足以为全国学风之表率, 梁启超寄希望于大学“有以表率我全国之学风, 而改善我全国之学风者”^{[1]244}, 并提出了具体要求。梁启超对北大学生提出的表率全国学风的要求, 从一定意义上说, 称得上是民国初期改革全国大学官本位学风的宣言书。

(一) 服从

梁启超认为, 学风败坏的原因在于学生缺乏服从的品德。学生“德之未修, 学之未成, 始入学校求学”^{[1]244}, 理应受校长教师的训导。军队言自由则溃不成军, 学生言自由则教育无效。以西方为例, 梁启超感慨美国学生对于师长“尽服从之

[收稿日期] 2020-09-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传统家风家教的现代转化与传承研究”(BOA180044);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科研基金重点项目“梁启超学风建设思想及其影响”(ECNUFOE2019ZD104)

[作者简介] 刘 婉 (1990—), 女, 安徽寿县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化与教育。

责”^{[1]244}的现实。他希望大学生自觉服从师长,自动矫正学业不精、恣意妄为的学风。同时指出青年学生对于学校和师长的不服从,是辛亥革命以前官本位风气的后遗症。那些在新式学堂中上课的学生,尤其是富贵人家或是官僚出身的青年人,大都无视师长的教育;有的官宦子弟往往视入学堂为可耻的事情,终日以准“老爷”自称。在此背景下,学生不服从的表现是罢课、匿名举报和揭露教师隐私,等等。对此,梁启超认为“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1]237},大学生没有处理好自由和理智的关系。与之一致,蔡元培亦规劝大学生要讲究自由与秩序,尊敬师长的人格自尊,“对于教职员,宜取宽谅的态度,不宜求全责备”^{[2]363}。然而,缺乏理智的大学生往往视自由为第一要义,无视师长的教诲和社会公德的束缚,易把自己变成道德低下、学习落后的人。基于现状,梁启超、蔡元培等均主张大学生要服从学校条约,尊重校长师长的人格和教学活动。

(二) 朴素

梁启超主张学生时代要有“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的处世精神。他以欧美、日本学生从小学至大学的昂贵学费为依据,道出求学成功的原因是能够苦学,能“积十余年困苦艰难之学生生活,始克学成而为世用”^{[1]245}。同时,他揭示了当时寒门学生较多,却出现奢侈、纨绔之风的不良现象,由此谴责青年学生不修品德、不务学业,提倡青年学生坚守朴素之风。从梁启超写给子女的书信也可以看出,他主张青年学生要不挥霍奢靡、驰心于外务,要将精力放在钻研治学上。1916年2月8日,梁启超在给梁思顺的家书中表达自己不再仕宦的愿望和欲在贫寒家庭环境中教育子女“自立之道”的愿望^{[3]28}。同年6月22日,在写给梁思成、梁思永的家书中表扬了儿子们苦学俭朴的求学态度。^{[3]31}可见,梁启超主张青年学生要艰苦朴素生活和治学,不养成好逸恶劳和贪图享受的习性。

(三) 静穆

梁启超认为,蹈厉精神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但是学生时代应该韬光养晦,因为蹈厉精神“当用之于做事之时,不能用之于求学之时”^{[1]245}。在校求学的时候,需要有冷静的头脑来压制浮躁之心,才能掌握精深的学问。养成静穆之风,需要坚韧的意志,不让自己的意志做了情欲的奴隶,所谓“人生而静,天之性;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4]。

时时刻刻磨砺静穆的品格,求学时方能读万卷书有所得。“孟子、荀子言存养皆以静为主”^{[5]147},后世孔门派二程、朱子、王阳明等皆主张读书须从静穆中有所得。梁启超悉数古代的静坐说,认为今日的知识分子多被外界干扰,“无一刻暇适”^{[5]151}。故此,梁启超建议青年学生每日可独自到公园或者空旷之地散步,以便“宁静其思虑,安顿其身心”^{[5]152}。在梁启超看来,静穆之风有利于大学生养成冷静的头脑,涵养奋斗的精神,在校时助其进德修身,毕业后助其事业成功。

二 何以提出大学生当“表率我全国之学风”

就学风文化现状来说,民初人们基本都是把教育看作升官发财的唯一门径,学生从学校毕业为的是求做官的资格^[6]。当时的学生“可概为‘游惰’与‘书虫’两途,而意气颓唐、精神散漫、志趣卑下,几乎成为通病”^[7]。对此,当时有学者指出,“人非至圣或至愚,罔不为社会风尚所左右。今之教者学者,当以努力造成善良学风,涵养多数青年,使不知不觉间自然赴诸向上之途。”^[8]大学是全国的表率,若大学校长和师生都奔走权门,那么军人、官僚更不用说了。所以谋求救国者,第一要立人心,要注重大学生人格和对国家民族责任感的培育,故“大学平素以最高学府自居,衣食于民,其速起为全国树立人格之先声,勿使东林复社地下笑人也”^[9]。知识分子关于学风文化的讨论,是梁启超持续关注学风建设的历史背景。

(一) 为培养新民而改革学风

1902年,在内忧外患的政治斗争中,面对山河日下的时局和民族危机,梁启超作《新民说》一书。在书中,他有感于中国传统的国民劣根性,提出改造国民的思想。中国人虽固有代代相传的独立精神,但是守旧思想阻碍了个人和民族前进的脚步,梁启超希望通过教育来培养具备“民德、民智、民力”三位一体的特色新民。这种特色新民要有“群体观念、公德思想、权利义务观念”等现代国民素质,其中,权利义务观念十分重要。“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1]241}如何培养少年的这些素质,关键靠教育。由此,梁启超极力主张实行新学制、开办新学校,让学生用传统文化修身立德,用西方科学知识武装头脑。可以说,民国初期现代大学制度的确立,使梁启超看到

了“在社会上造成一种不逐时流的新人”的机会。但是在培养新人的过程中,传统学风成为大学培养独立自主、德智体并进、奋发向上的新民之痼疾,所以必须进行改良。

(二) 为加快大学现代化改革

在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学改革成为教育改革的排头兵。中华民国成立后,归国留学生大力主张借鉴西方大学教育的制度和理念改革中国大学,倡导施行西方大学制度。以蔡元培为代表,他依据德国大学以对学术的追求为核心思想的大学理念,拟定了以学术为本位的《大学校令》,经过起草、审议,最终由教育部颁布《大学令》,在教育宗旨、科目标准、学位制度和治理结构等方面处处都展现出现代大学观。同时,资产阶级革命以来,自由平等民主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思想自由和学术独立观也受到知识界普遍的认同,学术独立观也主张学生应以学术研究为神圣理想,不应把学术当作升官发财的工具^[10]。《大学令》第一条即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11]。梁启超进一步阐述大学校的目的是“研究高深之学理,发挥本国之文明,以贡献于世界文明是焉。”^{[1]210}但是,在蔡元培1917年1月就任北大校长之前,北京大学依然校政腐败、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也就是说,“以官制为学生受学之报酬”^{[1]243}的风气并没有因为教育制度的确立而消散,所以蔡元培、梁启超都提倡从北京大学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而带动全国其他大学从官本位回到知本位,引导学生认认真真做学问,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大学。

(三) 为振兴中国学术文化改革

梁启超于1922年在科学社年会上作《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演讲。在肯定科学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百多年)取得较大进步的前提下,梁启超指出中国人对于科学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二是把科学看得太呆了,太窄了。太低太粗,指中国人认为科学不过属于“艺和器那部分”粗迹的学问,不懂不算耻辱;又认为中国科学虽不如西方,但是有超凡入圣的大本领和治国平天下的大经纶。太呆太窄指的是,部分肯定科学的人也未能了解科学的本质,他们以为科学就是数学、几何学、化学等学科知识,认为不打算当工程师的人就不用学科学。如果这两种态度保持不变,中国人会一直被看作“非科学的国民”,

在世界上也可能永远没有学问的独立。缘于此,梁启超寄希望于大学多几个教科学的教师,多几个爱科学的学生,宣传科学精神,做出科学发明,出版科学著作,改变传统思想文化界内容贫乏、因袭守旧的学风,振兴中国的学术文化,为成为东方文化强国而努力。

三 如何保证大学生“表率我全国之学风”

学生优良的学风一般包括:正确的学习目的和动机,正确的学习态度和方法,正确的学习精神,良好的学习习惯。在社会大变革时代,针对大学生怎样做全国学风表率的问题,梁启超从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开始,在不同场合中提出了宝贵意见。

(一) 专心学问:鼓励大学生德智兼修成为新民

鉴于清朝以官制为学生受学报酬导致学生汲汲于富贵功名的学风,又鉴于办新式学堂十余年来中国学生仍不知学问为何物的现状,梁启超勉励学生“以学问为目的,不当以学问为手段”^{[1]243}。大学生“当为学问而求学”^{[1]46},明确学习的正确目的,才能维护自身和大学的尊严。实际上,仍然是教育要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梁启超批评传统“老爷式”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没有国家观念和真才实学,只会追名逐利、抱残守缺,同时指出大学生可以从“服从、朴素和静穆”三方面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成为真正的懂学问的人。

梁启超同时也批评了学界重智轻德的现象。他以西方为鉴,说“泰西之民,其智与德之进步成正比例,泰东之民,其智与德之进步为反比例”^{[1]210}。未来欲力挽狂澜的新民要德智兼修,不能顾此失彼,而大学生是未来新国民的主要组成部分,当从学校开始,学习新知识、培养新品德。如果大学生进学校,只是求文凭不是求学问,那么这个学生的人格就有问题,这样的人一定没有“自发”的能力,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学者。为此,梁启超反复强调教育“教人学做人”“学做现代人”,他说“你如果做成一个人,智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智识却是越多越坏”。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德育价值后,梁启超积极参与大学文科建设以培养民德,并成功助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由于大学是驱动文明的精神力量,是一个社会的知识与道德高地,故梁启超鼓励大学生养成德智兼修的良好学风,将来成为振兴国家的新民。

(二) 正确看待科学:引导大学生运用科学精神振兴学术

针对学术界现有的弊端,梁启超进行了总结,并为大学生做学问提供了科学的思路。一是笼统。标题笼统,让人看不出学者研究的对象是什么。用语笼统,往往一句话可以从好几个方面进行解释。思想笼统,喜欢拾人牙慧,没有创新。反之,做学问要深切。二是武断。不喜欢寻找证据,不愿意说明理由,直截了当下判断。反之,做学问要谨慎。三是虚伪。语句上的虚伪表现在隐匿真实的证据,杜撰假冒的证据,歪曲解说事实等。思想内容的虚伪表现为情感表达的虚情假意,把无说成有来欺骗大众,把简单的道理故作深奥的道理进行解释。反之,做学问要忠实。四是因袭。没有任何批评精神,不锻炼批评能力,一味盲从前人,依靠前人的经验和智慧来进行研究。反之,做学问要别裁。五是散失。某些学术新发明,由于没来得及传授于人,而不能成为人类文化遗产。反之,做学问要注意传播。要想成为大学问家,就要不断养成用科学精神做学问的好习惯,同时养成“明敏、密察、别裁、通方”的能力,在研究中不断提高自己。

在文化现代化转化的环境中,梁启超认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1]241}大学生是要努力做学问和科研的,对于科学精神需要有正确的认识。然而,从清末建立近代学制算起到五四运动时期,科学教育在制度上得到保证不过20年^[12],学校科学教育设施和师资力量尚薄弱,人们尚缺乏正确的科学观念。基于此,梁启超主张大学生要了解科学精神的内容。一是求真知识。在科学研究中,各类问题都要通过种种实验、种种分析,最后得出研究结果。二是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科学研究不仅追求事物的本质,还力求考察出事物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科学家凭空捏造的,是依据许多证据,层层分析总结而得。三是可以教人的知识。做学问的关键在于要能“传与其人”。如果知识不能教给他人,不能帮助他人认识世界,这样的知识就没有任何价值。科学家的知识都是艰苦经验中得来,他们说一句话总要举出证据,他们主张一件事总要说明理由,所以读科学家的一部书或者听其一回讲义,既能知道他研究的结果,又能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梁启超希望大学生要正确理解科学精神的内涵,摆脱传统学术研究的弊端,在学术

界“建立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为振兴中国文化做出贡献。

(三) 培养责任意识:勉励大学生成为改良学风校风民风的模范

人生于天地之间,对于一家、一国和世界各有责任。为了“造就具有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共和国民,并通过个人人格的发展带动社会的发展”^[13],梁启超特别关注大学生责任意识的培养。

一是增强大学生研究学问和培养自我人格的责任。梁启超认为,大学的精神在于研究和发明,大学的目的既然是研究高深学理,那么其课程内容当“网罗人类一切系统智识”^{[1]241}。且学问为文明之母、幸福之源,故大学的地位和责任十分重大。青年人既然有机会受学于大学,当“负研究学问之大任”“保持大学之尊严”“以发挥我中国之文明”^{[1]243}。大学生既然要继承、发扬和传播中国文化,就要有谦虚谨慎、刻苦踏实、科学谨慎的学风。而良好学风的形成和学生的自我人格有密切关系。从表面看,优良学风凸显着大学生的学习目的、态度、方法和习惯,从实质上来讲,它也是一个人格的外在表现。所以,修养人格亦是大学生不可推卸的责任。在《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14]中,梁启超认为学风改革的目的是“使将来的教育得一新生命,换一新面目”,让学校不再是“贩卖知识的地方”,激励清华研究院学生努力做一个全面发展的“有价值的人”。同时,基于清华学生在全国青年中的声望,梁启超更希望清华学生以修养人格为突破口,承担“察一般青年的缺点,做移风易俗的工作”的责任。比如清华师生对学术自由精神的追寻,就得到了湖南大学等高校的辉映,“一种民族的科学的自由的研究发表,认真的学习,勇敢的生活,这就是我们要求树立的新学风……像清华同学希望的一样,在树立新学风后,师生间,同学间,没有猜忌,只有融洽,没有分裂,只有团结,没有因循敷衍,只有认真负责。”^[15]高校学生之间能够互相影响,说明梁启超将清华学生作为学风改革排头兵是不错的选择。

二是增强大学生建设学校和国家的责任。梁启超既感叹北京大学改造后的宏大规模,又点出其与欧美日本大学的差距,希望校长、教师和学生一起更加努力地去发展北京大学。“盖大学校之发达,校长教师与国家社会,虽同负其责,然与大学校有至密之关系者,实在学生诸君。”^{[1]243}梁启超主张,

大学生应该认识到自己和学校的紧密关系,积极参与大学的建设,尤其是学风建设。这一点,和雅斯贝尔斯所言“每所大学都要仰仗它招来的那一类人的态度能力”^[16]有相似之处。另外,大学教人成人的使命扩展到社会域,便是教化社会、服务社会。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大学生最终要走向社会,他们的言行往往会影响到社会上更多的人,进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风。所以,需要大学生从自我做起,特别要求大学生能自觉自立。因为有了自觉,自然会自立,一个人乃至个人会自立,“国家当然自立起来了”^{[1]243}。正如柳诒徵所说“今日国家社会之败坏,已如洪水横流,滔天绝顶”,若大学生能负改革与建设国家的责任,则“挽此沉沦”有一线生机^[17]。现代大学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知识生产结构,针对现实国难民情,借鉴开现代大学之先河的德国就一直主张高等教育要同国家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的事实^[18],梁启超提倡大学生要有社会服务和家国情怀。在《梁先生北海谈话记》^{[1]278}中,梁启超就劝勉学生要为理想事业而奋斗,如果人人能够尽力造成理想的新风气,国家自然不会沉沦下去。据史料记载,面对因旱灾受难的三千多万群众,北京学生联合会分组调查各地灾状,用文字或照片描绘各种灾情,发表于世,为求引起同情赈灾捐款^{[2]287}。而以优良学风受到梁启超称赞的东南大学,其中心工作就是“教育、科研、推广三者并重”,彰显了关怀社会、服务社会的特色^[19]。抗战时期国立西南联大联合办学则捍卫了民族精神,坚定了报国信念,起到了保种、保国、保文化的历史作用,凸显了中国现代大学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和感情。可见,梁启超寄希望于大学生肩负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责任具有前瞻意识。

四 启示

不可否认,梁启超的学风观具有时代局限性。但是,他寄希望于通过教育改革来培养社会需要的新民,希望通过大学生的优良学风带动校风,以优良校风带动民风,从而达到移风易俗的社会效果,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在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通过梁启超等人的努力,大学中传统的官本位学风得以逐渐解体,借鉴西方、立足本土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也最终建立,具有学术自由精神、科学实证精神和社会关怀精神的中国现代大学开始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鉴于当今高等教

育学风现状,梁启超关于学风改革的认识与见解具有一定时代价值。

当前大学生的学风主流是好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受学习无用论影响,部分大学生学习积极性下降。大学较为宽松的管理模式和较多的业余时间使自制能力差的大学生经常旷课、逃课,养成散漫的学习态度。在学习积极性下降的情况下,大学生变主动学习为被动学习,平时不认真钻研,期末考试临时抱佛脚。受读书赚钱论影响,部分大学生的学习动机功利化。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学生容易受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侵蚀,产生攀比、媚俗、奢侈的不良心理。在这种不良心理的驱动下,大学生把学习知识当作未来赚钱的工具。受不良学风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学习信念缺失。大学生是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处于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面对大数据带来的信息量,很多时候无法辨别真伪和善恶。同时,在从众心理的驱动下,看到同伴在经常逃课、玩手机、睡觉的情况下也能拿到学分,自己也开始进行上网聊天、看影碟、打游戏等充满诱惑力的网络活动^[20]。这些问题成为优良学风建设的障碍。

借鉴梁启超关于大学生学风改良方面的先见,当前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培养良好学风。第一,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培养目标,努力营造优良校风。高校可以通过设立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加强优良学风考风院系建设,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学习态度,树立远大的求学理想和自主自立的求学信念。第二,教师以身作则,坚守治学精神,带头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变被动为主动,和大学生一起培养“学术良心”,弘扬学术正气,真正起到学风为世风先导的道德垂范作用。第三,鼓励大学生坚守求知初心,学习并争当学风模范。一般来说,大学生群体中总有充满活力、积极进取、全面发展的模范学生,他们能够自觉抵制浮华、庸俗、萎靡不振的学风,弘扬扎实、严谨、活泼、创新的学风。就像现实一样,虽有学风不正的现象,但是亦多次出现学霸寝室包揽奖学金、学霸情侣被国际国内知名大学录取为研究生等新闻报道,一夜间被媒体广泛宣传,被大众频频点赞。这些优秀学生是良好学风模范。而优良的学风会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它往往由个人影响班级,由班级影响学院,进而影响整个校风乃至民风。大学生的个人力量有限,但是集体的力量无限。如果每一个大学生都能学习并争当学风模

范,那么大学就有望成为有大楼、大师和大学精神“三位一体”的一流大学。

[参考文献]

- [1] 梁启超. 少年中国说 [M] //丘桑. 民国奇才奇文: 梁启超卷.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8.
- [2] 高平叔. 蔡元培教育论著选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
- [3] 梁启超. 梁启超家书 [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9.
- [4] 陈戌国. 礼记校注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274.
- [5] 梁启超. 梁启超修身三书: 德育鉴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
- [6] 胡守棻, 郭一岑. 生产教育与传统教育思想 [J]. 东方杂志, 1934, 31 (2): 18-25.
- [7] 杨贤江. 创造新学风与整顿学生会 [J]. 学生杂志, 1925, 12 (5): 25-32.
- [8] 罗家伦. 青年学生 [J]. 新青年, 1918, 4 (1): 70-74.
- [9] 杨铨. 人格教育与民德 [J]. 东方杂志, 1924, 21 (20): 13-17.
- [10] 鲁幽, 周安平. 民国初期“学术本位”现代大学观——基于《大学令》的法律表达 [J]. 复旦教育论坛, 2017, 15 (6): 46-52.
- [11] 陈学恂. 中国近代教育文选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3: 332.
- [12] 王伦信.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国学校科学教育的境况和改革使命 [J].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版), 1999 (4): 75-81.
- [13] 杨俊铨, 刘婉. 蔡元培的中学德育探索与启示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9 (8): 173-178.
- [14] 梁启超. 清华研究院茶话会演说辞 [J]. 清华周刊, 1926 (389).
- [15] 湖南大学. 新的学风新的湖大 [J]. 湖大学生: 社论, 1929 (2).
- [16] 雅斯贝尔斯. 大学之理念 [M]. 邱立波,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社, 2007: 147.
- [17] 柳诒徵. 论大学生之责任 [J]. 学衡, 1929 (6): 54-66.
- [18] 王静修. 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构建与反思 [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7: 63.
- [19] 霍益萍. 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56.
- [20] 侯家刚, 山显光. 网络冲击下的大学生学风建设问题研究及对策 [J]. 中国成人教育, 2017 (8): 74-77.

(责任编辑: 上官林武)

Liang Qichao and the Reform of the Academic Style in the Universities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Concurrent Discussion on the Disintegration of Studying for an Official Position

LIU Wan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 Hai 200062)

Abstract: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ang Qichao was faced with the educational phenomenon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did not take learning as the purpose of learning. Based on the need of cultivating new people, speeding up the modernization reform of universities and revital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academic, Liang Qichao put forward the viewpoint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lead the way in the national style of study. He pointed out that university students should show excellent style of study from three main aspects: obedience, simplicity and stillness, and strive to set an example of fine style of study throughout the country. Through theory and practice, Liang Qichao points out the ways to reform the style of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first,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university students to define the learning purpose based on learning; second, to guide university students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scientific spirit; third, to cultivate university student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o correct the style of study. With the efforts of Liang Qichao and others, Peking University, Tsinghua University and other universities not only reformed the traditional style “studying for an official position”, but also accelerated the pace of modernization reform. Liang Qichao's thinking on the reform of the style of study has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ine style of study today.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should also stick to the initial heart of learning, develop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strive to be models of the style of study.

Key words: Liang Qichao; college students; style of study; knowledg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投稿网址: <http://xuebaobangong.jmu.edu.cn/jkb/>